



否认死亡的主体——对拉康与康德哲学中 主体分裂性的比较分析

林炜龙

摘要: 在康德哲学中, 主体的分裂性被放在了文本的核心位置, 这体现了康德对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区分上, 而死亡也因主体的分裂承担了不同的意义。基于对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区分, 康德提出了著名的四个“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是人类的理性认识力图超越自身的经验界限去把握物自体所产生的谬误, 而主体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也会产生这种僭越经验界限的谬误。本文将根据康德所提出的二律背反来进一步讨论主体在面对死亡时所产生的二律背反, 并将其与拉康的性化公式进行比较与分析。

责任编辑: 兰霞萍

收稿日期: 2024-10-07

接受日期: 2025-02-25

发表日期: 2025-06-20

关键词: 主体, 死亡, 精神分析, 二律背反

中图分类号: B151; B516.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957-370X (2025) 01-0024-08

一、自明主体与痛苦的主体

从古希腊开始, 主体的在场作为承担理性认识功能的预设就已经出现在了哲学讨论中。但是, 哲学家们一直都将其作为先验给定的存在, 并未对其做出深入的讨论。直到笛卡尔才真正地将关于主体的讨论放在了文本的核心位置。他通过对“我思”活动的分析, 发现了哲学中一直所预设的存在于“我思”背后的承担“我思”活动的主体的在场。并且这个主体对于笛卡尔来说是一个自明的主体, 而这种自明性则体现在他对“我思”活动的分析中。

“我思, 故我在。”笛卡尔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了自明主体的全部特征。对于这样一个主体来说, 意识活动确保了主体在场的存在 (existence) 的确定性。主体需要通过意识活动中的对象性指认反身地确定自身的在场。也就是说, 笛卡尔“我思”的主体仅仅是一种意识活动发生的基本要求性在场。但是对于这个主体“是” (being) 本身, 却无法道出任何东西。因此, 虽然笛卡尔通过对“我思”内容的分析给出了“我思”活动的自明性。但是事实上, 这个自明性是认识活动的自明性, 而不是主体的自明性。虽然主体的在场作为“我思”活动的承担者被给出, 但是对于主体真正“是”什么, 笛卡尔却无法从“我思”活动和“我思”内容中找到。



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笛卡尔在他通过“我思”活动确立了主体的在场的存在之后，他产生了对主体本质性存在的不确定的疑问：“但我还没有充分理解我是什么——而‘我’，必然存在”（笛卡尔 1993，18）。笛卡尔发现“我思”活动要求主体在场进行担保。然而，关于这个主体的本质，它的核心特性，尚未有明确的界定。笛卡尔进一步阐述，主体本身，绝不应当等同于它通过思维活动所认识的任何对象或内容。思维活动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无法被心理表征所捕获或局限在由这一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思想产物（即想象或感知的现象）的层面之中。

因此，虽然笛卡尔将关于主体的问题带入到了哲学的讨论当中，但是在笛卡尔文本中所隐含的主体的分裂性还未真正地进入到他的视野当中去。

而与“我思”主体不同——它作为一个所有认知活动的积极条件被预设。在精神分析中，寻求心理治疗的神经症患者首先是作为一种痛苦的主体表现在精神分析师面前。不同于我思主体，他们向精神分析师发问：我为何如此痛苦？患者的主体以痛苦的情感显现自身的在场。患者的我是“我痛苦，故我在”。症状中强烈的情感一方面标记了主体的在场，另一方面患者不知自己为何受苦。^[1]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笛卡尔的主体哲学与精神分析中的主体的不对称性。但是这种不对称仅仅是以不同立场表现的。在笛卡尔的主体哲学中，笛卡尔通过怀疑的方法，最终要求主体的在场来保证认识活动的进行。但是，这个主体并不能等同于认识活动及认识活动中的被思本身，因此它是以一种空无的姿态标记了主体。而弗洛伊德则对这个“我思”的主体采取进一步的怀疑。对于患者的主体来说，患者的症状、他在神经症中爆发的强烈的情感不适同样也是对主体在场的一种标记。但是，患者却不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何而痛苦。即使当患者表达了似乎是自己痛苦的原因时，他仍然不明白为何有人能不痛苦。^[2]

因此，患者的主体是一个怀疑的、不确定的主体。它与失败紧密相连，它不过是符号化的失败，是它自己符号表征的失败，主体与自身性的视觉及其语言中介相分离，相对于视觉与符号对应的直接被指称的形象来说，其永远无法实现一种完美的自我性。

二、康德哲学中的主体分裂性

现象的、经验中的自我形象与被要求为认识活动作保证、不朽的存在之匮乏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主体性。齐泽克在他的不同作品中认为，是康德，而不是笛卡尔将主体的分裂性真正地放在自己哲学文本的核心位置。他将康德的主体性与现象主体性的区别——即作为不可知的病态内核的“我”和作为以众范畴及一系列表象的自身显现的“我”之间的区别——和拉康的主体与自我的对应起来。在探讨康德与拉康的理论时，两者的主体概念均指向了一种“虚无”的状态，它们无法被压缩或归纳为具体、确定的经验现象性内容，以填充这个被视为异化、无具象形态的空无主体。拉康关于言说的主体与陈述的主体之间的差异，实质上体现了康德哲学中的某种区分；更进一步说，拉康所阐述的无意识主体，其实质也揭示了康德所强调的内省反思在构建稳定、明确自我同一性过程中的必然挫败。不同的是，康德将认识论的主体的综合活动看作是一种自明地构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而在精神



分析则以一种动力学的方式去考察“所思”，它更加关注实在、存在的匮乏对认识活动的推动。

在康德哲学中，虽然本体和现象的分裂被发现。但是，他的所有目的都只是为了避开对本体的讨论，从而去建立一个有机的经验的条件网络。康德设计了一套复杂而周密的哲学体系，这套哲学体系作为他的防御机制避开了他的原初的创伤——而这个创伤就是 he 不想提及的本体的空虚的深渊。康德所回避的空虚，实际上是隐匿在他所构建的认识论大厦、在他所有通过这些经验认识的条件网络所建构的道德哲学之下的本体论有限性的象征。就是在异化中被提及的，要么被主人能指冻结，要么被能指链推向不断追问意义的道路。康德的哲学难道不正是在逃避本体的有限性，即个体原初的缺失，从而走向在认识论上建构理论大厦，通过意义系统的永恒的持存来否定自身的有朽吗？而康德的主体——即作为被先验认识论所要求在场的主体——难道不正是对肉身的有限性的否定，不正是针对一个原始、纷乱且缺乏和谐的实在所做出的反应，进而自身孕育出了专属于否定自身的特质？实在的匮乏本质上反映了个体对“永恒”的渴望之失落，因为人类作为一个物质与性的存在，其生命注定在生与死的循环中流转。然而，人类从未真正拥有过他们所“失去”的“永恒”。这种“永恒”的概念往往只存在于初期的自我陶醉或是无意识的憧憬之中。而通过异化，进入到能指链，在象征界中对意义的永恒追寻则是对这种实在的匮乏的替代的防御性机制。并且，在选择不被主人能指凝固，而是进入到意义的永恒追寻中，也同样打开了一个象征的孔洞。正是这种双重匮乏，构成了现实与象征、想象之间永恒的鸿沟，从而也塑造了主体的独特构造。

齐泽克认为，康德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了类似强迫性神经症的特点。他具有一种强迫性的倾向，避免直面“本身”以及“Thing/原质”的挑战，这些挑战很可能触及主体自身死亡的深层次议题，而这些议题则是本体的有限性对自身的恐怖的质询。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无意识的主体是在被语言异化后的一种效果位置。作为一种位置，它与匮乏的实在保持距离，与作为有朽的肉身产生分裂。其根本的功能是对于塌缩回到物质基础的否定与拒绝。^[3]

因此，与想象中的自我形象不同，主体不是作为一个被认知的形象，而是作为一个“空洞”对认知活动进行担保，同时它自己本身就是认知活动的一种效果。在康德的认识论中，认知活动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即被认知的经验现象和先验的综合能力。对于前者来说，我们能够在其中建构自身的身体形象，因此作为现象，身体的有死性能够被我们所想象。对于他者的死亡来说，我们能够通过直接的目击或者听闻从而确定他者的死亡。这是作为一种以塌缩到物质而否定其意识活动的认知。^[4]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将这个身体仅仅作为身体形象来感知，而剥夺其可能具有的构思能力——对方从一个可能与我们平等地拥有思维能力的人被剔除了这种思维的可能性而只剩下一团恶心的“肉”。而对于自身来说，本己的死亡一方面可以借由对他者的死亡而想象性认识——一个躺在棺木中的一动不动的“人”；另一方面，由于在思考时，认知活动就在发生，而我们把死亡看作是认知活动停止进而塌缩到物质基础。因此，在知觉体验的领域内，认知主体绝不会接受“自己不存在”的假设；它不会认同通过“在世界中的存在”的彻底消逝来试图抹去那似乎根深蒂固、无法抹去的“自我存在”的印记。



作为对死亡的否定性主体，它并不在感知中被作为形象所给出。在先验的综合能力中，主体跟随“我思”一同发生。但是，“我思”总是伴随着“所思”内容，而主体却不能作为“所思”内容被给出。因此，被“我思”所担保的主体的在场，它是作为一个经验中的空洞与可朽的表象拉开距离。但是，由于其自身无法被言说而只是言说的效果，这意味着主体自身只是以一种非存在的方式存在着。

三、拉康与康德视域中的主体的分裂性

我们一方面在生活经验中，将主体当作经验行为的施动者，这是我们想象中的主体的形象，另一方面，主体的在场又是作为思维活动的承担者以经验中非存在的方式被给出。正是这种经验与本体上所存在的界限造成了主体的分裂。在拉康的文本中，这种主体的分裂性体现在了他对于三界的划分上，他进一步通过提出性化公式来分析这种主体的分裂性在生活经验上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而康德则提出了两种不同模式的二律背反，即力学和数学的二律背反，分析了主体的认识活动在跨越经验与本体上所产生的不同的问题。

首先是拉康的男性性化公式，它与康德力学的二律背反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拉康的男性性化公式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命题。第一个命题是“ $\forall x \phi x$ ”，它读作“所有的男性主体都服从于阉割法则”。这也就是说所有的男性都必须接受阉割法则的异化进入到社会系统中。因此在象征层面，每个男性都会在社会系统中以一个形象登记注册，他们都受到了经验上的有朽的肉体的可怖的威胁。但是另外一个命题“ $\exists x \neg \phi x$ ”则表明存在一个男性不受阉割法则的威胁。而这个在普遍性法则之下被排除的位置就是无意识主体的位置，同时也是大他者的位置。

我们说过主体的思维能力是不同于“所思”内容的。而主体自身又被要求在场来担保思想活动的进行。而这个在场本身只是作为一个“空”的在场存在。也就是说，它既被要求存在，又无法被说出。因此，它虽然是作为象征界的支撑点，但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例外存在。

但是否定性主体的非死性只是在实在的层面被给出，也就是说这个主体的在场不能作为现象被表征。因此，这个主体是以经验上非存在的方式拒认了有朽的肉体。它们对应了康德所提出的力学的二律背反，也就是上帝与灵魂是否存在的两个相斥的命题。在经验上来说，“灵魂和上帝不存在”与“人都是有死的”这两个命题都成立，因为我们无法在经验层面观察到灵魂与不死的人。而在本体上来说，“灵魂与上帝存在”与“有人是不死的”同样也成立，因为先验综合能力预设了主体与大他者的在场。所以，对于这两个命题来说，他们都是成立的。^[5]

主体与大他者的在场只是在本体层面对先验能力来做担保，它们在经验层面则是以非存在的方式存在。因此，“灵魂与上帝是否存在”和“人是否都是有死的”在正反两个命题都成立，这只是作为主体自身分裂的一种效果。也就是说，思维活动要求不被经验所制约的“空”的主体的在场进行担保，而主体自身的在场同样也需要“所思”来充实。因此，康德的力学二律背反以及拉康的男性性化公式也就对应了主体的分裂效果。就“灵魂是存在的”这个命题来说，它虽然表面上是以存在命题出现的。但是，它并没有给经验增加更多东西。相反，这个命题给现象界打开了一个孔洞。它否认经验



现象的自足性。因为对于被动接受的感觉经验，它仍然要求了一个观察者的在场来保证经验得以发生，而观察者本身却无法在经验中被给出。因此，如果存在命题仅仅指的是在经验上增加更多东西，或者保证经验世界的自足性。那么“灵魂与上帝的存在”则恰恰相反地将经验世界开膛破肚。

然而，分裂主体的效果不但使得实在于现象界刺穿了一个孔洞，同时，它又幻想自己在经验中也同样作为一个“不死的人”存在着。也就是说，它要求自身是“在世界上不死的人”。但是刚刚说道，“人都是有死的”与“存在不死的人”这两个命题只是作为主体的效果而成立，它们并不为经验世界增加更多东西，也不要求经验世界是自足的。^[6]相反，它们刺穿了经验世界，使得我们意识到经验世界只是作为人类认知的效果而存在。但是，对于“在世界上存在着不死的人”这个命题来说，它不再是将“人是否有死”作为一种主体的效果来说明，而是预设了经验世界是存在且自足的，并要求这个“不死”的人作为表象被表征。因此，主体在经验世界中幻想自己是“不死”的企图总是会以失败告终。

这种失败的幻想，在康德那里以他的数学二律背反被加以说明，^[7]在拉康那里，则是以女性性化公式来进对此加以解释。康德的数学二律背反主要是关于哲学中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即正论：世界在时间维度上拥有起始点，同时在空间维度上也存在边界；反论：世界既无起始点也无空间边界，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世界”一词被赋予了一个特定的定义，即“所有现象在数学视角下的总和及其全面综合的集合”。这一表述强调了对于这样一个现象的集合，无需再引入任何其他现象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因此，理性所关注的焦点便是这个无需任何附加条件的整体，即绝对意义上的所有现象。而世界作为我们的经验对象，那么它就必然服从经验的可能性条件。然而，这些条件要求经验的可能对象必须能够在被意识的现象范围内通过回溯或演绎在时空中被定位。而对于“世界”，这个绝对的全体现象的总和却无法作为被感知的现象在时空中被表征的要求。因此，当康德考察在数学二律背反的正反论中的预设，即“世界存在”时，康德发现这个被大众所接受的预设本身就是一个僭越的预设。因为，“世界”的内容既然是“所有现象在数学视角下的总和及其全面综合的集合”，而我们的感官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对全体现象的总和进行经验的。那么“世界”只能作为一个数学上的设定被给出，而无法在存在命题中占据主语的位置。它根本上是在数学上的一种穷尽的设定，而不是被我们所经验到的内容。所以，在康德的数学二律背反中，不论是正论还是反论都是不成立的。

而我们说，主体的幻想是“存在一个在经验上是不朽的人”。这个幻想对应了“世界”这个设定的僭越。它实质上是对现象界完满的要求，它要求现象界与实在相符。但是，实在只能在刺穿现象界时出现。因为，能指来说，它是作为假象而存在的。能指链的传递根本上只是一种对缺失的延迟的否定。因此，与我们无法经验到世界总体一样，我们也无法在经验上使自身成为完满的不朽的人。实在作为回溯性原因的地界，它并不与象征界相符。主体在象征界中所追求的完满的形象根本上也是对实在的误认。这个完满的形象总是作为一个对缺失的掩盖与否定给出，这使得它被设定为数学上的穷



尽点，但根本上它总是与实在错失，且不可能达到实在的地界。

康德的数学二律与拉康的女性性化公式也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它们都表明了主体在遵从符号律法的同时，又发生了对符号律法的僭越。琼·柯普洁在《性与理性的安乐死》中对康德与拉康这种逻辑上的一致性进行了分析：“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绝对的边界”，这是否定的解题，它否认了正题，却没有像反题那样继续做出一个相反的论断。在现象王国中，种种现象可以是不设限的，因为这可能要求存在一种本身不受经验之前提所限制的例外现象，并因此使我们的回溯（regress）打住，或者它采取了非现象的形式，比如空的形式：一个空的空间或一段空的时间。以上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明显不具有真的可能性。没有什么现象可以在理性的规则之外，而仅凭自身就成为我们经验的对象。或者说，没有一个现象不是可能的经验对象（或者都受制于回溯的法则）：“ $\neg \exists x \neg \phi x$ ”（不存在一个女性对象是不受阉割法则支配的）。

然后，康德接着消解反题，“在现象的连续中回溯—正如测定宇宙的体量，会无限地进行下去”。也就是说，我们承认现象的集合缺少一个边界，这并不会迫使我们去主张反题的立场——它们是无限的——相反这只要求我们承认所有现象的基本的有限性（finitude）也就是它们不可避免地隶属于时空的条件，并因此必然只能逐一面对，无穷无尽，永远没有可能到达一个终点，一个知晓全部现象的顶点。这个世界的状态不是无限的，而是不可确定的（indeterminate）。并非—全部（not—all）现象都是经验的可能对象：“ $\neg \forall x \phi x$ ”（并非所有女性对象都受阉割法则支配）。

正如琼·柯普洁所分析的那样，康德的数学二律背反表明了现象王国自身是在理性的规则之内的，但却又同时要求了一个僭越时空规则的顶点。而这正是分裂主体的本质。这个异化的主体虽然已经失去了自身最初的存在、与实在相分离，但它服从于符号律法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在其中找寻回自己已经失去的存在、对自身的缺失进行否定。而这便表现对缺失的拒绝，对死亡的拒绝。^[8]

在主体这边，我们可以将拉康的性化公式做这样的解释：一方面，“我思”主体总是离不开“所思”的内容。而在经验事物中，肉体是作为有朽的存在。因此，主体总是能够在他的死亡中、在经验事物的秩序中幻想出自己的死亡。这便对应了命题“不存在x，该x不受到阉割法则的支配”。另一方面，主体是对死亡的否定性拒认。在主体的幻想中，并不会是全部人都受到阉割法则的支配的，这个主体还是维持着全能感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自己正是那个有能力拒绝缺失的主体，而这正是主体运动的动力。这便对应了右下角的命题，即“并非全部的x都受到了阉割法则的支配”。正如拉康在《电视》中说道：主体的本质，即其固有的、不可抹去的存在状态（Dasein），实质上是对人类终将面临死亡的普遍事实的“反驳”。在普遍性的笼罩下，这一存在状态却在一个特定的例外情境中暂停了其普适性，表现为一种对死亡无限延后的可能性，其现实性的说服力在此刻显得尤为苍白无力。而这个例外的产生则来源于主体自身的分裂的效果。

结语

从经验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参考他人死亡时的样貌来想象自己死亡的状态。但是从本



体上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去体验自己的死亡。因为死亡是对主体的在场的否定，是对“我思”活动的否定，而我们的体验自身本来就是思维活动，它要求了主体的在场进行担保，这使得我们能够意识到是“我”在进行意识，并且我们对死亡的想象本身也是一种思维活动。因此，我们说主体自身是不能体验到自己的死亡的，他只能过通过他者来绘制自己死亡的图景。

然而，主体在死亡问题上总是发生认识功能的僭越，这就是说主体不仅仅在思维的持存中不能体验到自己的死亡，并且他还在经验上对自身的“有朽”进行否定，他总是追求着对生命本身的超越性。而这体现在了主体对于生命活动的意义的追求，主体所要求的生命活动的意义总是超过其自身本能的需求，他根本上是想要借由表象的持存来表征自身对有朽的肉体的超越，而这种要求正是主体运动的推力，它推动着主体由一个能指为另一能指所表征。因此，齐泽克也将主体称作否认死亡的主体，正是主体思维活动对“有朽的”、“可鄙的”动物式肉体的否定，构成了我们意义世界的生成和发展。而我们文化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不论是科技，还是文学等，正是思维活动对自身超越性所力图的证明。因此，虽然我们说主体在经验上对死亡的否定是一种谬误，然而它也构成了我们文明发展的推动力。

但是，当主体在经验上过分关注自己的死亡、无法接受自身的缺失，他无法对死亡问题进行压抑，并从意义的追求中获得享乐的时候，神经症就发生了。神经症的发生意味着患者不能够在日常生活所组织的意义中获得享乐与安适，而是需要极端的情绪与强迫性的思维来充当对缺失问题压抑的泄口。

因此，“如何对待死亡”构成了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待死亡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当下的情绪与体验，而正确地处理生命与死亡的关系则使得我们能够认清生活中假象的构成的同时，也能够日常生活所组织的意义中获得幸福与享乐。

参考文献

- [1] LACAN, JACQUES.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7, 26(3):84.
- [2] LACAN, JACQUES. frits:selection. New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16(5):73.
- [3]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ed. John F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2):105.
- [4]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ed. Sylvanna Tomasell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5):204.
- [5]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1, The Psychoses 1955-1956,ed. Russell Grigg. London: Routledge. 1993, 15:223.
- [6] FINK•BRUCE. The Lacanian Subject: Between Language and Jouiss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2(3):125.
- [7][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74.



[8] [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 邓晓芒,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38.

The Subject in Denial of Dea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ubject's Divisibility in Lacan and Kant

Lin Weilong

Abstract: In Kantian philosophy, the divisibility of the subject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text, reflecting Kant'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oumenon and the phenomenon. Death, as a result, assumes different meanings through this fractured subjectivity. Building upon this dichotomy between the noumenal and the phenomenal, Kant proposes his renowned four "antinomies." These antinomies arise when human reason attempts to transcend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experience to apprehend the thing-in-itself, thereby generating contradictions. Similarly, the subject commits such transgressions of empirical boundaries when confronting the problem of deat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ntinomies produced by the subject in the face of death through the lens of Kant's antinomies, furth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m in relation to Lacan's formulas of sexuation.

Key words: Subjectivity, Death, Psychoanalysis, Antinomy

作者简介 (ID):

林炜龙, 男, 伦理学硕士,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研究生,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100号上海师范大学。邮政编码: 200030。